



新疆师范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丛刊

XIYU LISHI YU KAOGU YANJIU



西域历史 与考古研究

侯 灿 著

中西書局



新疆师范大学
黄文弼中心丛刊

XIYU LISHI YU KAOGU YANJIU



西域历史 与考古研究

侯 灿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 侯灿著.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

ISBN 978-7-5475-1626-3

I. ①西… II. ①侯… III. ①西域—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9182号

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侯 灿 著

责任编辑 李碧妍 邓益明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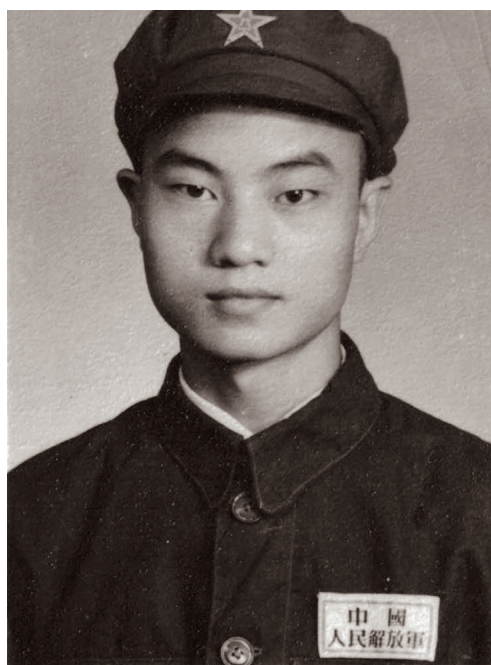
字 数 733 000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626-3/K·310

定 价 16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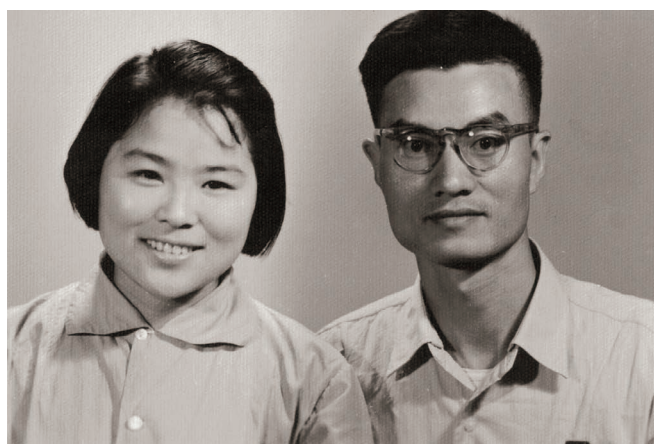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21-61453770



1952年夏



1959年2月12日与母亲合影（摄于故乡合川县城）



1967年11月10日结婚照



1971年6月全家合影于农一师六团



1956年8月26日欢送侯灿同志升学川大留念



1961年8月2日四川大学历史系1956级毕业纪念



1979年12月楼兰考古



1979年12月3日于楼兰



1980年4月楼兰考古工作中



1983年5月1日启功教授（中）与贾兰坡教授（右）在新疆延安宾馆研究楼兰出土木简



1988年10月31日在新疆社科院接见瑞典国家电视台制作人Stig Holmqvist（中）时留影



1988年10月11日在高昌故城西南大寺院与长泽和俊（右）、伊藤敏雄（左）相会



1991年11月16日留影于九州大学学术演讲厅前（西谷正教授寄赠）



2015年2月22日全家合影

怀念侯灿先生

孟宪实

每当想起侯灿先生，心中就不免愧疚上升。得知侯先生生病的消息并不晚，但并不认为有多严重。有一次跟侯先生通话，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心想看来侯老师的病是好转了。后来让夫人专程前往上海看望侯先生，我自己竟然没有去。现在想起来，最后一次见侯先生，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侯先生去日本讲学经过北京，荣新江、姚崇新和我一起跟侯先生见面，还在北大门口照相，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2016年9月，侯灿先生去世了，享年八十。一个多月之后，吴美琳老师才打来电话告知，当时手握电话，全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其实，当时的情绪被悔恨塞满：这么多年，怎么竟然没有去看过侯老师……

最后一次接到侯先生的电话，是来问《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出版的事，时间大约是在2016年的春天。现在知道了，侯老师平缓的声音中，隐藏着极度的焦虑。他真的想在生前看到这部书出版，很有可能他对病情的好转已经放弃了希望。我尽力给先生以肯定的回答，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过去出版一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学术影响不错，以侯灿先生的研究声望，他的文集加入这套丛书，一定能增光添色。其实，这套丛书当时可能已经夭折，但我并不知情。我知道国学院的人事变动会影响此书，主持者说人大出版社人事变动巨大，极大地影响了这套书的出版。侯灿先生的文集，是以手写稿的方式寄来的，我更担心的是，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好几年，一直没有动静，千万不要把手稿弄丢了。最终，书稿并没丢，五年过去了，就如同交出去的时候一模一样，书稿还装在侯先生用来邮寄的那个纸盒之中。但侯先生却注定再也看不到了。我自己固然人微言轻，是不是努力不够啊，这是无尽的愧疚之源。

侯灿先生是四川合川人，曾当过四年兵，然后进入川大考古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农一师的宣传科，十二年后才回归专业，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87年，从新疆考古所调入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早就知道侯先生。当时新疆考古已经很吸引人，吐鲁番文书、楼兰考古等，极具社会影响力。我们这些考古门外人，都知道新疆考古学家的大名。新疆师大是个年轻的学校，师资力量除了高校新分配来的以外，主要来自中学和行政单位。如侯先生这样研究成果众多的学者，大家其实很少接触。特别是侯先生曾经是楼兰考古的领队，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在人们的想象和讲述中，侯先生个人都充满神秘色彩。

侯先生调到师大历史系，我是第一受益人。这不是当时的认识，这是事后的总结。我原本在大学毕业后想继续从事所爱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但1987年考上南开大学研究生却无法就读，对我的思想史研究也有冲击。此后两年，我也在想思想史毕竟以社会为思考对象，也许社会史更能说明历史问题。我的唯物主义思维，促使我寻找社会史的问题进行思考。吐鲁番出土文书，就在这个背景下进入我的视野。出土文书，没有经过别人的改动，百分百地社会现实反映，从文书入手，最有利于社会史的研究。这种简单的思考，浮于问题的表面，完全是言不及义。就在这时，侯先生来到身边，如同“天使”降临，侯先生成为我请教的老师。研究吐鲁番文书要从哪些书入手，怎么获得研究资料，所有基础性的问题，都来自侯先生的教诲。我几乎天天要到侯先生家请教，侯先生每天都要为我开课，使我的学习大有进展。1989年9月，我草成第一篇吐鲁番的论文，讨论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的时候，侯先生跟我一样高兴。从此，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学术生活。到如今，研究吐鲁番文书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回想最初的感受，无一不是从侯先生开始的。把所有的同类文书抄写在一起，把所有的研究观点排列到一起，分析它们各自的根据与不足；把墓表资料按时间编排起来，看看哪些官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尤其官员的晋升，观察是否有规律可循。时间长了，很多镜头都变得模糊。是我在床上排比墓表，或者是我看见侯先生在自己的床上排比，……每有一个想法，总希望得到侯先生的赞成，每次获得赞成，就如同小学生一样高兴，觉得这一天没白过。

侯先生的家与我家是两个相邻的居民楼，从我家的阳台上能够看到侯先生家的厨房灯光。侯先生的夫人吴美琳老师，原是上海知青，先后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当老师。侯先生的家总是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在沙发边上的一个小桌上，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搪瓷小盆。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黄底红花的搪瓷盆。每次喝茶的时候，吴老师就笑咪咪地打开小盆：“小孟，选一块。”里面有各式糕点，真是太可爱了。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美好。

侯先生的四川口音始终如一，每次要强调什么的时候，侯先生就会先说“小孟啊！”声音有些尖锐。这时，我的所有思绪会突然停顿，头脑里只剩下侯先生的一个声音。后来从新疆出来读书，听到侯先生教诲的机会越来越少。有的时候，比如正在看书，忽然会听见侯先生的声音从身体很深的地方涌出：“小孟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猛然停顿下来，迅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这是什么？这就是耳提面命的效果，多年不忘。

侯先生治学，以新疆考古为主，但不是所有新疆考古问题都研究，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深耕。侯先生的学术，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其次是楼兰，第三是和田。侯先生常说：作学问最怕没有资料，无米下锅，神仙也没用。新疆的考古资料，当然以吐鲁番出土最为丰富，不仅有大量的纸文书，还有可观的墓表、墓志资料。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历次考古资料都比较容易找到。资料以中国保存为主，这一点几乎只有吐鲁番考古如此，因为解放后吐鲁番的考古资料，明显比解放前的资料要丰富。加之，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获资料也在中国，所以吐鲁番资料获得比较容易。侯先生有这样的思路，老一代学者都能理解。研究敦煌吐鲁番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者严重受

限，主要就是很难接触到国外的相关资料。侯先生没有参与过吐鲁番考古发掘，所以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利用文物资料，侯先生研究高昌王国的郡县问题，讨论各个时期的高昌所奉年号问题，特别是利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的墓表资料，排检分析，写出《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巨文（1984年），对于高昌官员的几个系列和等级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即使今天也必须参考。吐鲁番资料，侯先生用功最多的应该是墓表资料。1990年，侯先生著《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很长时间以来几乎一直是最重要的吐鲁番新出墓志资料来源。2003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出版（巴蜀书社），至今依然是最权威的资料著作。

侯先生的楼兰研究，是作为考古学家引人注意的。经过前一年的勘察，1980年春天，有东西两支考古调查队进入楼兰故城地域，侯先生是西队队长。在一个月的考古调查中，收获丰富。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楼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深受各界重视。1984年，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一文，因为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1988年《文物》第7期，发表侯先生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集中展现了1980年楼兰考古的新成就。长期整理楼兰出土资料，研究相关问题，1999年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可以看作是侯先生多年积累的结晶。有关和田的研究，侯先生主要是围绕麻札塔格古戍堡进行了讨论，涉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和田绿洲的变迁等问题。

学术研究难免会落下遗憾，侯先生也如此。有一段时间，我看见侯先生把所有的高昌史料都摆了出来，卡片密密地布满大床，侯先生想整理出麹氏高昌的朔闰规律。大约是199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侯先生家，侯先生说了声“小孟啊！”这次，声音有些低沉。侯先生拿出一本《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其中有王素先生的大作《麹氏高昌历法初探》，文后附有长长的《麹氏高昌朔闰推拟表》。学术撞车了，侯先生的功夫白费了。侯先生显然很受打击，苦笑着：“这就是学术啊。”这样的事，只能坦然接受了。有关楼兰考古的报告，至今只有简报，没有发表报告。侯先生已经调到新疆师大，整理工作似乎并没有停止。我确定看到过他的书稿，书名类似于《楼兰考古调查报告》，见其中有表格，有线描图，也有照片，尤其对照斯坦因等从前的工作说明如今的进展，感觉很有学术意义。不过，我关心的是高昌问题，楼兰的事不太在意。后来听说，侯先生把书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由于某些原因，书稿无法出版，个人的功夫又白费了。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是考古报告，那么所有的资料和研究也作废了，这就不是一个人的损失了。我曾专门联系相关单位请求予以支持出版。可惜，侯先生去世后，我一再追问，侯先生的家人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

侯先生在历史系上“考古学概论”课，特别欢迎同学对有关考古的问题进行探讨。侯先生指导的学生，我所知的有姚崇新和张莉。姚崇新是那个班的班长，毕业时竟然不能留在乌鲁木齐，侯先生努力帮忙，介绍他去了吐鲁番文物局，从此踏上学术之路。张

莉的故事我都是听说，她接受侯先生指导读书，帮侯老师翻译西文资料，从而对西域考古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后来读硕士、博士所作问题都与西域研究相关。

侯先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博物馆和考古所时期进行，到了新疆师大，核心工作是学术研究。正是到达新疆师大之后，侯先生的重要成果纷纷出版，影响日著。媒体采访、学术演讲，时亦有之。日本九州大学与新疆师大建立合作关系，日方的考古学家西谷正教授与中方的侯先生是双方学术代表，多次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题对新疆各地考古遗址进行考察。加之楼兰考古的新成果，引起日本学界如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1988年，日本学术界为纪念“中日邦交和平友好协议签订10周年”，特地邀请侯灿教授前往日本参加名为“迷幻传奇的古代国家——楼兰特别报告会”，围绕楼兰考古与丝绸之路，侯先生在日本举行多场报告会。此后，侯先生多次应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1990年，侯先生的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学术论文选集，由书名可知，主要选取的是高昌和楼兰方面的研究论文。这是中国的出版困难时期，在出版问题上，中国学者的窘况人所共知。侯先生的著作得到了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的资助，最初的出版动议也是西谷正提出的。他想选一些侯先生的论文翻译成日文，供日本同行参考，而第一步是先在中国出版一部论文集。论集出版了，总共只印制了1200册，可想而知，很快就洛阳纸贵，今天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之后，侯先生的研究没有止步，除了高昌历史以外，楼兰史的研究又增加许多，所以《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是前一部书的升级版，内容更丰富，价值更高。比如围绕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侯先生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而前一部书没有收入，现在都纳入本书，尤其是丝绸之路研究和和田历史研究的论文，更是新近加入。和田作为丝路南道的核心绿洲，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从佛教历史的视角看，和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侯先生对和田的研究，也是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再结合文献和考古进行研究的，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丝路变迁尤其是和田绿洲的变迁，意义重大。特别是如今丝绸之路研究大热的情况下，本书会为这个课题再增新资源。《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可以看作是侯灿先生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是他个人的论文全集。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了这次重要的出版活动，毕竟是老单位有感情啊。

本来应该作者写后记，现在只能遗憾地由我代笔。愿侯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并理解。

2019年6月18日北京老营房路

前 言

为何要研究历史？怎样研究历史？凡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首先面临的的就是两个问题。这里我不想作理论上的探讨，因为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会作出各种不同的回答或解释。我只想谈谈几十年来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体会和认识。我认为历史是由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方面的因子构成的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纵向排列整合而成时间系列，可以谓之断代史或通史；横向排列整合而成空间系列，谓之地域史或地区史；这些事件以人物研究为中心谓之人物史；以集团、集群为研究中心谓之阶级、民族史。其目的在于求实、求真、求是。首先是求实，时间、地点和人物是不是事实。落实了事实，还必须求真。这就要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以求其事件的真实面目、真实性质。最后再经过事件内因和外在外条件的研究，以求其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这就是求是。至于论及方法，也就是研究手段，我采取的是三个结合：一是结合考古学发掘出来的可靠资料；二是结合史学文献学上的历史记载或历史传承的有关资料；三是结合历史地理学上关于利用山川物象研究聚落、城镇、交通路线的方法，以求其事件发生、发展、变化范围和影响。“三求”的要求和“三结合”的方法，就是我治史的指导思想 and 操作方法。收入本书的文章也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和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由于各篇文章在当时所具有的水平、占有的资料、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文章思路逻辑考虑成熟一些，相对写得较好一些，而有的文章考虑不那么成熟，因此写得不好。好与不好都是我治学的历史记录，再回过头来审视一遍，却也反映了我的治学历程。因此收入本书的文章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除了核对史料、纠正排印错误以外，一般未作改动。个别文章后来有了新资料、新见解必须要作改动的，也都在文末补记、附记或注明中予以说明。

收入本书的文章共计 40 篇，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西域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计 8 篇；第二组，吐鲁番历史与吐鲁番考古研究，计 22 篇；第三组，楼兰考古研究，计 10 篇。这些文章不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研究问题相类或相近归类。为便于读者了解或理解每组文章所论史事，我在篇首收入了一两篇综述或概要性的文章。现就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与相关情况扼要介绍如下。

一、西域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

这组收入了《从文化遗物遗迹看新疆（西域）是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和《略论我

国历史上的西域》两文。此两文是我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时，开设“新疆通史”课程时讲授的导论。前一文的题目很明确地从文化遗物遗迹入手，阐明今天的新疆，古代称为西域的地方，从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这既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也是祖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后一文阐明了古代西域的历史概念及其被新疆指代的由来，论述了这块土地的地理特征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进而讨论了古代西域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两篇文章表明了我对这块土地的政治态度，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今天中国历史学者的天职。

本组收入了《汉晋时期西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及其文化》两文。汉晋时期是中西文化对西域影响最重要的时期，由西汉至东汉前期无疑中原文化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而东汉后期至曹魏西晋时期，西方文化特别是犍陀罗文化的影响最为重要。我把塔里木盆地粗分为三个地区：一是楼兰鄯善区，这里通行的是佉卢文楼兰语；一是和田疏勒区，这里主要通行的是婆罗迷文直体，也就是于阗文区，说的是于阗塞语；一是焉耆龟兹区，主要通行婆罗迷文斜体，说的是月支语。历史上的民族语言，特别是已死亡的一些民族语言，是难以攻克的复杂课题。如果要与这些民族在人类体质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研究，更是令人难以攻克的课题。我虽然对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问题下过一些功夫，进行过初步梳理，曾把楼兰鄯善地区和于阗疏勒地区的人种，归于欧亚内陆塞人人种的范围，他们是在不同时期迁来的居民，把焉耆龟兹地区的居民归属于月支西迁时留下的居民，但仍有许多缺环不能明了，这些看法很不成熟，仅供一些研究者参考。

收入本组的还有《从考古发现看塔里木绿洲环境的变迁》和《麻扎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两文。前一文是1981年秋天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王守春同志一起，由考察塔里木盆地绿洲沙化过程中收集的资料撰写的论文，后者是1984年10月参加新疆国土整治局组织的科考队，进入和田河下游地区，路经麻扎塔格（山）对古戍堡考察后撰写的论文。两文的共同特点是从居民聚落、城镇变迁和交通路线的变化，阐明了塔里木盆地南缘沙漠扩大的沙化过程和其北缘沙漠盐渍化的变化，提出当前人们在利用资源、开发绿洲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收入本组的还有两文，一文是《略论东丝绸之路与日本九州》，此文是我任职于新疆师范大学期间，日本九州大学与我校结为友好学校后，我曾三次应邀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此文第一部分是1991年12月8日在九州大学举行的九州史学会年会上，以《东丝绸之路与日本九州》为题作的发言；第二部分是1995年1月10日在九州大学文学部举行的国际交流报告会上，以《再论东丝绸之路与日本九州》为题的讲演。两个部分改题为“略论”后，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上刊布，我想这对促进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两校的友好交往是有纪念意义的。另一文《丝绸之路学的涵义、内容及其方法》，是应甘肃《丝绸之路》杂志社为“丝绸之路学”的理论构建而写的特约稿，尽管意见不很成熟，我想提供给这方面研究者的一些思路，也许是有参考价值的。

二、吐鲁番历史和吐鲁番考古研究

本组收入的有《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此文落笔时间较早，虽对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吐鲁番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收获没有涉及，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吐鲁番学的来历及其形成作了介绍，并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古墓区的 13 次发掘，所出土的大量文书和文物，对在我国兴起吐鲁番学研究热潮的背景作了概要介绍。

本组收入的有《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和《再论 4—6 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三文。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时间，因此历史年代学的考察成为首要问题，对于前凉的年号，当时出版界出版的几种年表莫衷一是，而且吐鲁番出土文书已见“建兴三十六年枢铭”“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和“升平十四年残文书”，而楼兰早在斯坦因拿走的文物中就有“建兴十八年”木简，这就证明现行年表记载的前凉年号肯定是有问题的。我继续按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年号，对照现行年表的几个版本寻查，撰成了《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后又随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即在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出土了咸安五年、麟嘉八年、庚子六年、玄始十年等朱书陶器，敦煌和吐鲁番当时都属河西政权管辖，再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上的一些年号补充讨论，撰成《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一文。为使读者明了这些年号交叉纷繁的复杂情况，我还着意设计了一份高昌奉行年号一览表，附于文末。表中分列高昌分期、历史朝代、一般年表记载年号年数、高昌奉行纪年数以及出土文书文物记载年号年数，这就便于读者查考。《再论 4—6 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是我在 1991 年 10 月出访日本期间，在东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所作学术讲演后，日本朋友就我讲演中涉及的不同意见提出的一些看法，回国后草拟成的一篇商榷性文章，当然，我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对白雀、龙兴（昇）、建平几个年号仍然无法落实。

收入本组的还有《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以下简称《官制研究》）和《再论麴氏高昌将军戎号与宿卫兵将》（上、下）两文。有关麴氏高昌官制的史籍记载，无论《梁书》《周书》或《隋书》《北史》都不能解决出土文书和砖志中涉及的一些职官问题。因此，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和精力，作为一项专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撰成了《官制研究》一文。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收集的官制资料的节录，下篇是对节录资料的研究。文中首先是对前人研究官制成果的评价，然后展开讨论。我认为麴氏高昌官制可分为将军戎号、王府中央、东宫王都和郡、县、城诸个系列，其官品级别分为九个等级。这些官职的来源一是继承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二是模仿当时内地中央政权的，也有一些是麴氏高昌因时因地因事自己设置的，但以前两者为主要。这项研究成果时至今日，我认为基本系列和官品等级并无大错，所以，在我的专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中加以引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文落笔时，我把资料中不属于麴氏高昌的四方墓砖也列入其中讨论，是不妥当的。这四方墓砖是：《张幼达墓表》所书“龙骧将军散骑常侍”，《张兴